



轉型期國際政治的觀察

深層思考與 思考深層

劉必榮著

深層思考與
思考深層

劉必榮著

三

民

叢

刊

4
1

三民書局印行

深層思考與思考深層：轉型期國際政治的觀察／劉必榮著。--初版。--臺北市：三民，民81
面； 公分。--(三民叢刊；41)
ISBN 957-14-1863-3 (平裝)

1. 國際關係-論文，講詞等 2. 中國-外交關係-論文，講詞等

578.07

81001073

◎ 深層思考與思考深層 —轉型期國際政治的觀察

著 者 劉必榮

發行人 劉振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

編 號 S 57011

基本定價 叁元叁角叁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1-1863-3 (平裝)

寫在前面

對國際政治發生興趣是從十五歲開始。那年我們退出聯合國。同一個時期，也正是保釣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所以對許多參加過保釣運動的前輩而言，我是真正的後學。可是這些前輩的身影，却在我心裏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並且逐漸開始發酵。我不斷問自己：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它會是這個樣子？在得不到滿意答案的情況下，我立下了研究國際關係的志願。

大學我唸的是政大外交系。大一那年，有一次在高中校友會上，碰到一位高我一屆，當時就讀臺大政治系二年級的學長。他跑來問我：「怎樣？讀出興趣沒有？」我笑著說：「我從十五歲就已經有興趣了。」這位學長今年也從國外回來，加入了東吳政治系的陣容。顯然他和我一樣，都沒後悔當年入錯行。

大學畢業後，我僥倖考上教育部外交政策學門公費留學，於民國六十九年負笈美國，進

1. 面前在寫

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高級研究院就讀。民國七十一年秋，再轉往傑佛遜總統手創的維吉尼亞大學，攻讀國際政治博士。美國經驗啟迪了我的思考。不管是約翰霍普金斯時期，那種位於華府，天天接觸世界權力中心的緊張、興奮；還是維大時期，那種在夏綠莊草坪上，和師友漫步講學論道的安逸，每一個階段都讓我得到許多的啟發。孔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道理，在這時期更是一次又一次讓我深深體會。這個體會對我日後的寫作分析有很大的助益。

民國七十五年回國後，我進入東吳大學任教，同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進入了《中國時報》。在報禁開放後的將近三年裏，我在晚上兼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的工作。對一個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也是一個極棒的經驗：白天，我在學校從事理論的研究，晚上，我守在新聞第一線上，把理論用於實際。嚴謹的學術訓練，幫助我在事件發生後，能夠立刻掌握來龍去脈，而站在國際新聞第一線所接觸的資訊，也返回去豐富了我理論的內涵。

《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在世局發生重大變動時，也常把我找去交換意見。余先生八十多歲的高齡，但神采奕奕，老當益壯。他對國際局勢的充分掌握，總讓我自歎不如。跟余先生談話，我常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和當年在夏綠莊和指導教授冷師炤銓問學論道

的感覺一樣。

《中國時報》還提供了我出國訪問的機會。一九八九年，二月，我到雅加達採訪柬埔寨和談。後來我發現這種學者兼記者的雙重身分，給我很大的方便，讓我接觸到許多實際從事政治運作的檯面上人士。而很多外交工作，事實上也可以靠新聞從業人員這樣穿針引線的。一九八九年正好也是國際局勢發生劇烈變動的一年，東歐共產政權的崩潰，就在這一年驚天動地地展開。

為了準確掌握世局的脈動，我索性向學校請假一年，好隨時出國，對國際局勢作現場觀察。一九八九年我在東歐待了一個月，接著九〇年，九一年我又各去東歐待了一個月。對東歐的近距離觀察，讓我對共產主義的崩潰，以及崩潰後那種由烏托邦摔落現實世界的空虛、脫序，有了比較深刻的體會。

除了東歐以外，我也去過外蒙和南非，這些都是變動世界中，世人注意力的焦點。身為一個國際政治的研究者，站在新聞現場的直接觀察，常讓我感到有掌握世局脈動的興奮。

這本集子裏收錄的，是我民國七十六年底到《中國時報》後所寫的專論。我在《中國時報》有一個每周專欄，民國七十七年上半年叫做「周聞焦點」，後來改叫「周聞評述」。民國七十九年九月我辭去國際新聞中心主任後，改任社論主筆，所以這裏也收錄了我寫的一些社

3・面前在寫

論。在國際關係學界，有作一般理論研究的（即所謂generalist），也有作區域研究的（即所謂specialist），我所受的訓練屬於前者。從事一般理論研究的學者，可以把理論適用在不同的區域，所以我關心的地域也很多。但這裏所收錄的文章，仍以我最關切，或親自去過的地區為主。這些地區我所做的觀察也比較多，其中或許有一些可以刺激一些朋友、先進的進一步思考，藉收拋磚引玉之效。

過去我寫國際政治專欄，也和傳統的寫法一樣，放進很多事實、分析，但却比較少加入評論意見。七十七年底我做了一個重大的改變，我開始在文章中放進了比較多的觀點。我認為一個專欄作家不只要提供資訊，更應該提出看法。我第一篇改變文風的文章，是七十七年十一月，評論巴勒斯坦建國的專欄。我不曉得我這樣做對不對，因為很多細節就這樣被犧牲了。可是我也接到很多朋友的電話鼓勵。所以我對國際局勢的分析，也逐漸朝由上往下看的宏觀面分析方向走，而少鑽到事件中間，作細部發展的補述。我不想提供事實，因為事實很容易過時，也不見得有結集出版的必要，我想提供的是觀點。觀點至少可以刺激思考，或引起爭辯。

在我三年來數百篇的專欄與社論中，我選了這幾篇，算是我現階段國際關係思考的總結。近幾年來國際局勢瞬息萬變，誰也無法做出準確的預測。但我們却至少應該試著，從紛

5・面前在寫

亂中理出一點頭緒。我感謝所有教過我國際關係的師長，感謝《中國時報》的長官，感謝三民書局，也感謝淡江大學中文系的周志文教授，沒有志文兄的鼓勵催生，這本集子根本不能出版。

最後，我願意把這本書獻給我的指導教授冷炤銓先生，和《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我對他們是常懷感恩的，沒有他們給我的教導和機會，我根本不會是今天的我。

深層思考與思考深層 目次

寫在前面

中華民國外交

中國正不斷地縮小……	3
從幾個角度看釣魚臺事件……	6
大陸政策與外交政策的深層思考……	10
開創外交新局需要官民全力合作……	14
中歐關係「突破一點」之後……	18
從臺北角度看波斯灣和戰迷局……	22
從波灣危機思考我們的國際定位……	26
從承認波海三國問題看我國的外交作為……	30

向前看，不要往後想！……

放眼國際應有所為，有所不為

為我國外交突破喝采

拓展外交全憑實力而非一廂情願

我應如何建立「亞洲視野」？

積極因應亞太局勢新結構

南非政情

專訪南非大使漢麟士談南非的外交突破

流刺網傷不了多年深厚友誼

談南非的政治改革

一九九〇年代南非的外交與國防

戴克拉克會是南非的戈巴契夫嗎？

那密比亞模式的真與假

黑白交融會混成灰色天空嗎？

跳出思考框架、拓展外交空間

從約堡看普勒多利亞臺北關係冷熱

中斐關係會在南非外交突圍下動搖嗎？

波斯灣戰爭

從幾個不同角度看中東危機

波灣危機三個層次的困境與出口

聯合國動武決議通過之後

波斯灣和平初露曙光

波灣衝突的戰與和

波灣危機的「戰爭」、「外交」與「政治」

中東秩序與「美國和平」

從波灣戰爭反省國際政治的權力內涵

美國推動中東和平的障礙

東歐

層深考思與考思層深 · 4

演員更換、戲碼不變、「悲情城市」仍在上演？！

「後共產主義時代」的波蘭工農問題

波蘭——在矛盾的政治結構中掙扎

波蘭外交是怎麼成功的？

培植改革種子 綻放民主花朵

擺脫沈重包袱、踏出石破天驚的第一步

「我對推動政治改革從不後悔！」

捷克政治改革的前瞻

羅馬尼亞：是陰謀還是悲劇？

羅馬尼亞——十二月革命的迷霧

南斯拉夫種族問題剪不斷理還亂

保加利亞改革之路風雨飄搖

穿越黑暗、迎向光明

5·次　　目

- 兩德統一的陣痛與禁忌……
德國統一的省思……
民族主義、國際主義與統獨問題……

中華民國外交

作為一個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我一直很細心地觀察我們自己的外交政策，也曾經很努力地思考，希望能為我們的外交

尋求一個出路。

中華民國的外交實在是一個異數。在一個以強權政治為基調的國際社會裡，我們不但能夠在中共的威逼下存活，而且能够不斷發展出新的模式，以務實的做法開創出新的外交空間。這在國際政治上早已經變成了一個極佳的研究個案。

可是我們却不能以此為滿足。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努力，開拓更多的空間，提升更高的外交層次。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累積和中共和平競爭，以及將來進行兩岸談判，謀求和平統一的本錢。

下面這一系列文章，就是這兩年來我對中華民國外交政策定位和做法的思考。其中一些是專欄，但大部分是社論。透過社論的表現方式，透過這些文章，我希望能引起一些對我國外交政策取向，與外交角色定位的參考。

中國正不斷地縮小

——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大與小

《紐約時報》記者克里斯多福 (Nicholas D.Kristof) 上週在北京發出一篇特稿，談中國大陸在國際上日漸式微的影響力。《國際前鋒論壇報》三月廿八日頭版頭題登出了這篇特稿，而其所下的標題赫然是：「不斷縮小中的中國 (Shrinking China)！」

中國大陸真的縮小了嗎？克里斯多福指出，如果不看幅員大小，而看所謂的「政治地圖」，則中共對世局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在許多西方外交官、學者及商人眼裏，的確是在不斷縮小之中。一位歐洲的外交官就向克里斯多福表示，自從六四天安門及去年下半年一連串東歐的遽變之後，「現在已經沒有人關心中共了！」

克里斯多福根據其採訪所得，歸納出西方外交官及商人之所以認為中共的重要性大不如前的三個原因：第一，對中國大陸市場遠景的幻滅。尤其是六四天安門之後，許多西方商人已對中共是否仍會堅持改革並開放市場表示懷疑。

第二，在八〇年代，西方人把中共想像成「可愛的共產主義者」，其在世界銀行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表現，都像明星一樣可為他國表率。可是現在這一切鋒頭都被東歐搶去了。現在世局改變的象徵是東歐，不是中共。

第三，當蘇聯的威脅日漸減少之際，中共的重要性也相對減少。一位美國外交官就表示：「中共最擔心的就是無法在美國和蘇聯中間拉一個打一個了。中共——美國——蘇聯的三角遊戲至少在現階段已經結束了。李鵬到蘇聯，戈巴契夫到北京？誰管他？」

當然，克里斯多福也表示，有了這三個原因不是代表中共就不重要了——中共仍有核子武器，仍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仍然有十一億人口。但問題是，過去世人在乎中共，他們所看的也不只是人口和核彈頭而已，中共總還要拿點別的東西出來才行。就像一些西方商人所說的：「你說中共有潛力？有潛力的國家多啦！」

克里斯多福在文後還提到臺灣。他說雖然我們不可能把臺灣視為國際強權，但是我們卻無法不注意到臺灣的外匯存底是中共的五倍，而其國民平均所得是中國大陸的二十倍。雖然臺灣兩千萬的人口不到大陸的百分之二，但臺灣的對外貿易總額比中國大陸要多百分之六，而且還在不斷增加之中。言下之意，對臺灣有相當多的肯定。

克里斯多福的文章相當引人深思。本來，國際政治上什麼叫「大」，什麼叫「小」，本就